

# 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中国方案及其世界意义

于春洋 周佳薇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摘要]** 国家民族观念塑造是当代多民族国家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是多民族国家为达成提高国内各民族成员的国家民族身份归属感与认同感目标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中华民族不同于西欧初创民族国家中的同质性国家民族,也与存在于美洲、东南亚地区乃至非洲的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民族有所不同,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兼具内生性与实体性、拥有多元一体内部结构的国家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式国家民族观念的塑造方案。该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上的重要创新,其内容由搭建认知框架、打牢思想根基、积蓄前进动能和建立情感共识四个方面构成,夯实物质基础和提供制度保障则使该方案的顺利实施拥有来自物质和制度两个维度的必要支撑。这一“4+2”方案所蕴含的共享政治权利且追求各民族真实平等、兼顾民族与区域因素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及其深层次理解、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并正向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中国智慧,对于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观念塑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世界意义也由此彰显。

**[关键词]** 国家民族;观念塑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民族国家;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 D032;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24) 04-0047-13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4.04.006

## 一、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

本文讨论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是“具有国家形式并表现为国民共同体的民族,即‘nation-state’中的‘nation’”<sup>[1]</sup>。国家民族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国家民族于西欧民族国家初创进程之中得以生成,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典民族国家范式中的“一个民族”。

国家民族对内共享国家领土主权和国民身份,对外则宣示拥有明确的地理边界。需要说明的是,把国家民族称为“国族”,亦即可以视具体叙事语境的不同而将国家民族与国族互换使用,已是国内学界进行相关研讨的常态<sup>①</sup>,只是要注意区分作为国家民族简称的“国族”和作为20世纪前期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带有鲜明同化主义性质的“国族建构”的“国族”<sup>②</sup>。而在作为国家民族简称的意义上使用“国族”,是国内学界的通用做法。伴

**[收稿日期]** 2024-04-17

**[作者简介]** 于春洋,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周佳薇,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意义和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2-GNG-019)、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2FMZB001)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此类学术成果很多,例如: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J].政治学研究,2010(3):85-96;邹诗鹏.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J].天津社会科学,2014(1):14-21;厄内斯特·勒南,陈玉瑶.国族是什么?[J].世界民族,2014(1):59-69;许纪霖.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J].西北民族研究,2017(4):10-20;任剑涛.“中华民族”叙事:国族证成中的古为今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1):5-21。

<sup>②</sup> 对此,邹诗鹏指出“不应因为20世纪前期在国族建构上的激进化及其弯路乃至歧路,而否定‘国族’概念对于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应有意义”。参见:邹诗鹏.从国家民族及其认同建构看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1):25-34。

随世界历史的展开,产生于西欧的民族国家开始全球扩展,很多并不具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基础的移民国家、殖民地“国家”与传统帝国,或主动学习效仿,或被动裹挟卷入,纷纷建立起各自的多民族国家。及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催生了新一轮的民族国家建构,人口迁徙和民族间的跨文化流动也随之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曾经作为经典民族国家范式的西欧国家的内部民族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多个民族共存于同一个国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多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普遍”国家。由此,提高国内各民族成员的国家民族身份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的国家民族观念塑造议题随之生成,成为当代多民族国家共同面对的重要实践问题,也成为中外学界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 (一) 知识准备:国家民族观念塑造述要

随着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展,国家民族的结构样态也在发生着变化。曾经的一国一族模式逐渐淡出,让位于一国多族的现实。与此相伴随,怎样把共存于多民族国家中的多个民族整合成一个衍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进而让这些民族认同自己的国家民族身份,提高这些民族成员的国家民族身份归属感与认同感?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任务也就由此生成。

众所周知,观念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之中的主观反映,并通过情感、认同与行为取向等多个维度加以体现。由此,在由多个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之中,国家民族观念也就体现为不同民族的成员对自身所归属的这个国家民族的情感依恋、身份认同及其在日常行为习惯中所展现的倾向性。一旦国家民族观念植根于各民族成员内心深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乃至民族团结也就成了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各民族成员对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产生,达成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国家”。鉴于此,所谓国家民族观念,也就是在民族结构非同质化的、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内部,形成一个让各民族成员都自视为该国家民族一员的身份观念体系。而国家民族观念塑造,则是多民族国家为达成提高国内各民族成员国家民族身份归属感与认同感目标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国家民族观念是维系民族情感与

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而国家民族观念塑造对于多民族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结合当代世界主要多民族国家的实践经验,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基本路径有三条:其一,推崇各民族共有文化符号,激活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而共有文化符号是各民族之间的交集,如图腾象征、英雄崇拜等有助于激活或恢复各民族共有历史记忆,维系国家民族内部团结。其二,强化各民族成员的国民身份及其对于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借助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公共政策实践导向的引领来强化国民身份,淡化狭隘族属意识。这些举措也会提升各民族成员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可度,增进归属感。其三,通过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来凝聚国家民族共识、强化国家认同。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在凝聚国家民族共识、强化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实施一系列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发挥学校教育的政治导向功能,有助于凝聚共识、强化认同。

#### (二) 多民族国家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随着多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普遍”国家,把国内数量不等、文化各异的民族整合为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相重叠的国家民族,已经成为当代多民族国家捍卫主权完整、维系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民族团结的关键基石。这也使得国家民族观念塑造成为确保多民族国家拥有政治合法性的底层逻辑,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普遍性由此生成。当今时代,国家民族观念的塑造对于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价值已经无需多言,其深远影响也不必赘述。多民族国家要想保证自身的存续与发展,其民族政策必然要以引导国内不同民族群体认同统一的(同时也是唯一的)现代主权国家为取向。只有赢得国内各民族的认同,多民族国家这一国家结构的存在才能真正拥有合法性。

从这一点出发,通过制定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民族政策来引导国内不同民族形成稳定的国家民族观念,进而以一体化的国家民族样态去认同国家,就成为当今世界每个多民族国家必须去完成任务。这一任务在美国表现为以“肯定性行

动(affirmative action)”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印度尼西亚表现为“潘查希拉(pancasila)”原则及追求民主和平等的政策;在尼日利亚则表现为“联邦特征原则”与撤区建州政策等<sup>[2]</sup>。这些积极的民族政策无疑正向推进了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过程,展现了这些国家在本国国家民族观念塑造实践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与此相伴,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特殊性也得以呈现。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国家民族是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兼具内生性与实体性、拥有多元一体内部结构的中华民族。显然,当代中国也面临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任务,这一点与当今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是一样的。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不同时期国情现实紧密结合,先后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契合本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而在这一进程之中,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体系也得以不断成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sup>[3]</sup>。有研究指出应当在“国家民族及其认同建构的意义上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4]</sup>。结合这一观点主张可以联想到,在党的民族政策话语之中,有多个关键表述与强化国家民族观念有关,如“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及其全方位、多维度的实施过程尤为引人注目。这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在强化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观念方面,已经探索出了一套既符合本国国情、凸显本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而这一方案的实施,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和谐稳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从国家民族的类型学分析入手,就中华民族能在何种意义与多大程度上作为“国家民族”的问题进行学

理讨论,进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中国式国家民族观念塑造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其世界意义进行阐释,就显得十分必要。

## 二、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 的限度与边界

一旦从多民族国家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视角来观察中国,这一问题也就转换为怎样把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场景中的国家民族叙事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既不是同质性的原生国家民族,也不是想象中的衍生国家民族。

### (一) 中华民族不是同质性的原生国家民族

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其实原初的西欧民族国家是不需要进行“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因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民族国家和国家民族是“一体两面”的:有了民族国家,也就有了国家民族;反之亦然。它们的国家民族是同质性的,而民族国家则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屋顶”。族裔民族主义所追求的“一族一国”理想符合初创西欧民族国家的历史真实,然而一旦脱离这个特定时空场景,它也就从创建民族国家的积极力量转而成为威胁既有民族国家存续的破坏性力量。比较而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兼具共同性与差异性、呈现“多元一体”结构的民族共同体。对于拥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超大规模共同体而言,中华民族的内部包含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经由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延绵发展来到今天。因此,无论是相较于曾经存在过的西欧初创民族国家中的同质性国家民族,还是族裔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显然与之迥异,不会是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民族。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是民族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产物。它的形成,受到地理环境塑造以及民族交往深化、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刻影响,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sup>[5]</sup>理论能准确反映和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内部结构,同时也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和合”

中的“和”字有相济、相和之意，“合”字则指契合、合一，其核心问题是处理“一”与“多”的关系<sup>[6]</sup>，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路高度一致。也正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引导下，历史上的中央政权都竭力协调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各民族在共同的疆域、历史、文化、传统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结构中的“多元”，决定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国家民族成长过程之中，始终秉持承认和尊重多样性的进步文化观；而“多元一体”结构中的“一体”则是对共同性和一致性的肯定与强调，形塑、推动和引领“多元”始终在“一体”的框架之内呈现其多样性。“多元”与“一体”既对立又统一，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结构。

## （二）中华民族不是想象中的衍生国家民族

回到发生学的逻辑，基于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展，衍生形态、外生形态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其国家民族的产生也就具有了迥异于西欧原初民族国家的不同特点。在西方主流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家民族是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意指通过民族主义来建构的民族（国族）。在美洲大陆、东南亚地区以及非洲广大地区，主要都是移民社会和“破碎地带”，历史上多经历过或长或短的殖民统治，并不存在一个与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独立建国的国家相重叠的国家民族。因此，为了实现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典民族国家范式独立建国，它们就需要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进行广泛社会动员，通过“民族符号的想象”<sup>[7]</sup>区分“我者”与“他者”，建构一个“想象的”国族共同体，从而让“一个民族”在反对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横空出世，新生的民族国家也由此确立。

近代中国虽然也曾因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华民族显然不应等同于西方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想象的共同体”。其理由主要在于：“想象的共同体”虽然并非对民族（nation）全然的虚构，但终究局限于意识层面的建构，是“对本民族实际上不确定（uncertainty）、不可靠（insecurity）、不安全（unsafety）的生存状态的现实反映”<sup>[7]</sup>，是有“名”而

无“实”的民族共同体；而与之对比可见，中华民族作为延续了五千多年从未间断的文明的载体，“内生性”与“实体性”正是其优势所在，是先有“实”而后有“名”的共同体，与“想象的共同体”相去甚远。从“内生性”观察，该属性是中华文明跨越五千多年历史长河延续至今的自驱力量。在“天下观”“大一统”思想主导及中华文明自身吸引力等多种合力的交互作用下，中华民族由早期的“满天星”逐渐走向聚合统一，并最终形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而通过“血缘攀附”<sup>[8]</sup>等方式实现的“家国同构”<sup>[9]</sup>内在结构，也持续孕育出基于血缘和地域共同体的稳定情感，从而形成绵绵不绝的内聚力量。同时，这种内生性有别于精英阶层的主观“想象”，能够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变的进程中发挥“黏合剂”的作用，并为中华民族提供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从“实体性”观察，中华民族的实体性是其客观属性，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形成于春秋至秦汉时期的“大一统”理念及其实践推动了历史上各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生成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并赋予其丰富的共同体属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sup>[5]17</sup>，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这一过程并非依托于“想象”（imagine），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历史进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 （三）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结构的实体国家民族

那么，是不是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就不适用于前文有关多民族国家通过政策供给来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讨论呢？这主要取决于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国家民族”这一概念。如果是作为西欧民族国家经典范式中的同质性的国家民族，或者是将国家民族的概念置于西方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之中，亦即通过民族主义的动员来构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视角对其加以使用，那么这个概念对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显然是并不适用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民族观念与西方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更多强调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理念，而非单一的、排他性的狭义民族认同。但如果是在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意义上，即

把多民族国家视为一种“普遍国家”,在普遍面临把国内各民族整合成为与该国内政版图相重叠的人们共同体的层面来使用国家民族,那么这个概念就适用于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以及中华民族。中国是当今时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中华民族则是在多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民族在中国这一具体国家之中的特殊表现形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海纳百川,不是同质性的国家民族,也不是“想象的共同体”。在西方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家民族往往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的构建作用,却难以顾及民族的内生特质。而这种内生性正是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优势所在<sup>[10]</sup>。由此,“中华民族”概念与现代西方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定义并不兼容,而只是在当今多民族国家把国内“多民族”整合成统一国家民族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因此,中华民族既承载了五千多年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展现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独特特性,又融合了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特性,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民族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有效规避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在民族建构过程中可能导致的内生性缺失问题,更凸显了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表达,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适应了现代国家发展的需求。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使用国家民族的概念来解读中华民族的时候,必须留意这个概念与孙中山的“国族”论以及国民党在实施汉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时所采用的国族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就此郑大华指出,在发现“五族共和”之论不能代表国内所有民族等缺陷后,孙中山转而开始“提倡一种‘大中华民族’或‘国族’观”,这种国族是“以汉族为中心同化满、蒙、回、藏等其他民族而形成的”,究其实质,“不过是汉族的‘改称’而已”<sup>[11]</sup>,其目的是恢复汉族的民族主义。蒋介石则公开发文否认中国国内存在满、蒙、回、藏等各“民族”,主张称“宗族”或“宗支”,而这些“宗族”的“融合”构成中华民族<sup>[12]</sup>。对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sup>[13]</sup>。

总之,中华民族既不同于同质性的西欧民族

国家中的国家民族,也不同于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而出现在南北美洲、东南亚地区和非洲的那一类国家民族,更不是孙中山的“国族论”和国民党在实施民族同化政策时所假借的“国族”,而是一种与同质性的原生国家民族、想象中的衍生国家民族相并列的,一个历史悠久、兼具内生性与实体性且内部结构呈多元一体特性的国家民族。

### 三、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中国方案

当今时代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重要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与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大家庭”话语、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两个共同”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抓好“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等内容一脉相承。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提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全方位、多维度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sup>[14]</sup>,并把这一要求写进新修订的党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方案正式得以确立。综而观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中国方案,已经初步形成了由搭建认知框架、打牢思想根基、积蓄前进动能和建立情感共识四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全方位、多维度政策实践布局,而夯实物质基础和提供制度保障,则使该方案的顺利实施拥有来自物质和制度两个维度的强大支撑。

#### (一) 搭建国家民族观念的认知框架

就搭建认知框架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的重要阐释<sup>[15]</sup>,这一阐述为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础与理论视角,也使该理论从学界主流理论上升为国家政策话语。在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进程之中,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绕不开的思维工具。有研究表明,目前学术界热议的与中华民族有关的焦点议题,其讨论大多建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sup>[16]</sup>。同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仅是一种理论视角和思维工具,更是一种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结构化描述,是对“和合”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它提供了正确理解和把握“多元”与“一体”关系的认知框架,即“承认和肯定多元,但并不将这种‘多元’或者‘差异’本质化、固定化”<sup>[17]</sup>,而是更加积极地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保持我国民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看清这一事实,有助于理解并维护在历史中形成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及其“超稳定结构”<sup>[18]</sup>的底层秩序。此外,这一认知框架也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脚手架”,有助于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观,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等,把社会各方力量、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政治话语的“生活话语”<sup>[19]</sup>转向。

### (二) 打牢国家民族观念的思想根基

就打牢思想根基而言,从2015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首次提出,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五个认同”<sup>①</sup>被作为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反复强调、重点要求。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sup>[3]</sup>这一重要论述明确点出“五个认同”与新时代强化国家民族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五个认同”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创新话语,把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摆在与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并列的高度。此举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要走向繁荣富强,仅仅依靠政治上的联合

是不够的,还需实现各民族成员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认同”。“五个认同”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容<sup>[20]</sup>,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源泉,将其具体化为延续中华民族内生性的关键力量,可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成长为认同度更高、内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并为强化国家民族观念保驾护航。由此可见,“五个认同”是新时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

### (三) 积蓄国家民族观念的前进动能

就积蓄前进动能而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10月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义重大。《意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的关系打通,强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并且指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sup>[21]</sup>。《意见》是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政策文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就是践行民族平等团结原则,“将自下而上的群众实践活动与自上而下的政府运作有机结合起来”<sup>[22]</sup>,通过多领域、多形式的宣传教育、主题创建、基地建设等方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成员的社会日常活动中具象化,从而增进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为新时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蓄宝贵的前进动能。此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的“联盟现象”<sup>[23]</sup>是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拓展载体、提升创建工作水平的创新,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系统展开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支持。这一点也证明了我国当前对国家民族观念的强化不同于“想象的共同体”中强调精英阶层的建构,而是更加尊重各族人民的主体地位,确保各民族共享各项发展权利。

### (四) 建立国家民族观念的情感共识

就建立情感共识而言,党中央先后提出了

<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参见: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N].人民日报,2015-08-26(1)。

“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sup>[24]</sup>，“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sup>[25]</sup>等一系列政策话语和方向指引，强调要在尊重差异、守望相助的基础上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在各族人民群众之间广泛形成情感共识，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感来强化共同体意识。“四个共同”<sup>①</sup>所概括的，既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资源，也是用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共识的重要基础。“四个共同”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内生性”力量，是推进各民族从“血缘攀附”及“正统之争”走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sup>[24]</sup>的重要力量，也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sup>[3]</sup>的基础和前提。此外，在国家层面，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并行不悖，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和拓展渠道；多措并举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助力形成经济上、文化上、心理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格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各族群众在互联网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掌握“虚拟空间”的舆论主动权，防止不当言论、错误立场破坏民族团结，伤害民族情感；等等。上述政策措施共同营造了助益各民族形成情感共识的良好氛围，为国家民族观念的强化夯实情感基础。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在夯实物质基础与提供制度保障两个维度着力探索，为落实国家民族观念的方案实施提供强大支撑。就前者而言，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表述虽落脚于“意识”，却不仅是精神、观念层面的问题，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基础。为此，我国在历史性地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同时，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及其落地方案，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并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政

策目标等，这些都是夯实物质基础、全面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就后者而言，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历史“长镜头”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sup>[26]</sup>，也决定了“统一”成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先决条件；从现实条件看，我国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要素各异，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法享有自治权，体现的是“国家对区域内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权利的肯定和尊重”<sup>[27]</sup>。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有机结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政策导向，夯实制度保障。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塑造并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方案，极具中国特色，它的提出及其全方位、多维度的政策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上的又一次重要创新推进，不仅体现出中国智慧，也为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国家塑造国家民族观念提供了借鉴启示。

####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世界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结合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提出的，是具有系统化、整体性并且凸显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密不可分，与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与拥护密不可分，也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建构”<sup>②</sup>中的民族建构底层逻辑密切相关。作为该方案的核心主体，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文明史

①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参见：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②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包含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两个不同面向，其中的民族建构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核建构，旨在把国内各族群整合为拥有共同政治文化特质的国族，其目标是实现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参见：于春洋.外观与内核：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4):11-15。

不仅并未成为民族“化石”,还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后仍保有鲜活的生命力。与此相对比,“欧洲分裂成诸多民族/国家,即便在民族国家内部,也存在着难以统合的因素”<sup>[28]</sup>;依托“一国一族”原则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张力。在多民族国家成为普遍事实的今天,国家民族观念塑造已经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中国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方案对于维护国家认同与族际和谐、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较之于其他多民族国家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政策过程及其经验教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方案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这种参考借鉴价值与进步性也使其世界意义得以凸显。

### (一) 共享政治权利且追求各民族真实的社会平等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中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离不开历代中央王朝制度设计的助推。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保障各民族真实平等、塑造国家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只有保障各自治地方内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自治,同时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置于最高位,才能确保各民族的真实平等;此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各民族群众广泛参与的、持续深入开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sup>[29]</sup>的有效平台和现实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以平等的主人翁身份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践行民族平等团结原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得到巩固和增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着种族歧视问题,加之特朗普当选总统乃至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表现出的族群政策逆潮被警察暴力执法事件放大,使得今日美国的国民特性日益走向撕裂;又如,印度尼西亚在民主化转型时期提出的“双轨认同”不过是该国政府为维系民族关系和谐而进行妥协的产物<sup>[2]</sup>,其政策取向的一贯性与制度实施的长期性都难以保证;再如,尼日利亚“联邦特征”原则由于其边界的模糊性而被普遍认为是加剧民族排斥的重要原因<sup>[30]</sup>;还有如法国的制度漏洞,导致外来移民长期处于结构性的不平等之中,这也是该国增进国家民族认

同遭遇挫折的“症结”之所在<sup>[31]</sup>……这些国家针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或是由于时代背景的转换、政治领袖的更迭、执政方式的变化而缺乏内在稳定性和一致性,或是仅仅停留在、满足于法律层面的平等政治权利,而无意追求乃至排斥各族之间的真实平等。究其原因,这些国家通过政策实施所能企及的仅仅是政治上的平等,即国家基于政治制度/体制的程序安排而给予每位国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殊不知穿上这种“政治平等”外衣的国民,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多么的不平等,而这种给予政治权利的“实际结果,就是以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sup>[32]</sup>。与这些国家的涉民族政策止步于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政策在确保各民族共享政治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长期致力于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领域内的真实平等。这种对于各族人民真实社会平等的追求,自然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 (二) 兼顾民族与区域因素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及其政策实践,为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提供了一种缩小国内各民族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全新思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很多民族地区受限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然而,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如“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精准脱贫”“一带一路”等,成功地为民族地区注入发展活力,使其经济得到协同发展。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兼顾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实现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夯实国家民族的共同利益基础。更重要的是,民族地区的大多数问题是地区性的公共问题,比如扶贫开发问题、边疆建设问题、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等,因此,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的原则。如此一来,既避免了将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一般性社会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也避免了民族边界与(行政)区域边界过分重叠的问题,为民族地区经济稳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作为对兼顾民族与区域因素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目标的延伸,习近平总书记



在谈及与周边国家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大计问题时要求,“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sup>[33]</sup>。这种与周边国家建立高质量合作的愿景,也是对中华民族和合精神的理性外推。其思想内核在于坚持以“相济”与“合一”的原则来回应当民族利益诉求、协调民族关系。可以说,中国在强化国家民族观念进程中实施的经济发 展举措,为多民族国家内部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外部适应经济全球化乃至实现全球经济发展成果普惠共享都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思路。

相较而言,印度因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内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陷于暴力袭击频发的局面<sup>[34]</sup>;菲律宾则“通过‘法律法规’的‘文明形式’”加剧国内山地民族在经济上的边缘程度,导致其“土著化”<sup>[35]</sup>。这两个国家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国家缺乏针对“民族地区”的旨在缩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ethnic groups)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思路及举措,也就更谈不上因人、因时、因地对政策实践进行持续调整和完善了。而我国之所以能够兼顾民族与区域因素,其底层逻辑是“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36]</sup>。正是由于“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基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想问题、办事情,而兼顾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恰恰是党坚持“两个结合”的集中体现。由此,“两个结合”为从认知到行动层面真正做到兼顾民族与区域因素提供了可靠保障,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 (三) 推动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及其深层次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sup>[3]</sup>。在国家民族观念塑造进程中,民族文化是维系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团结的重要情感纽带,而这一纽带能否发挥其应有之义,关键在于对文化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尺度把握。若过于强调共同性,则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所分析的那样,一旦某个边界内实质存在多族群的民族国家生出“想要建立一

元化国家的渴望,已经迫使其境内受威胁的少数民族走向自治分离之路,亦即走向‘黎巴嫩化’”<sup>[37]</sup>。如若出现这种情形,国家民族观念的塑造也就难以为继了。相反,如果过分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样不利于塑造国家民族观念。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其根源是西班牙中央政府对“强化本民族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弱化西班牙‘国家层面’或‘一体层次’的‘国家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十分姑息”<sup>[38]</sup>,从而导致该地区“独立”公投危机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始终注重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将中华文化视为大树的主干,那么各民族文化就如同茂密的枝叶。只有确保树干的坚固与深植,枝叶才能得以繁茂生长。“根深干壮”是前提,“枝繁叶茂”是表现形式。在尊重和包容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方面,必须承认作为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过程。有研究指出,“中华民族在文明化进程中突出表现的包容性,如今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公共价值”<sup>[39]</sup>。因此,既要避免文化“同质化”,也要避免多元文化主义的侵蚀,应坚持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相比之下,美国渗透到“文化基因”层面的种族歧视,马来西亚有关“土著”与“他者”的族群政治<sup>[40]</sup>所导致的族群关系分化……这些问题之所以会长期存在,追根溯源与这两个国家长期缺乏对于国内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尊重包容有关。

### (四) 构建互嵌式社区正向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为强化国家民族观念之中国方案的政策实践方式之一,在社会建设层面积极推动建立民族互嵌式社区,可以有效发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效果。这一举措为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常态化促进国内各民族和谐共生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内的各民族共创共享疆域、历史、文化、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构建互嵌式社区的前提条件,也是我国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巨大优势。通过促进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来

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关系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实现民族交融不是为了消除民族差异,而是为了促进各民族相互接纳、吸收、包容”<sup>[41]</sup>。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构建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与美国的“马赛克”模式截然不同,是与“民族交融”紧密联系的“一种民族关系的正面描述”<sup>[42]</sup>。这种以和谐共生为目标的社会治理模式,蕴含着谋求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中国智慧”,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推动全球治理秩序稳定发展提供有效理念及实践范式。

相比之下,美国现行的族群政策至今依然拒绝赋予少数族群(除了印第安原住民之外)以群体权利;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则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政策<sup>[43]</sup>;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人”(Kazakhstani)公民认同的包容性正在日益收窄,少数族裔的抵触情绪也在升温<sup>[44]</sup>。这些国家更多是采取“防守”的姿态来缓和族际冲突,虽然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摩擦力,却从根本上缺少对于常态化的族际交往关系的积极正向引导。究其原因,这些国家既未能在政策执行层面真正贯彻落实包括少数族群/族裔在内的族际平等原则,也缺乏维持和增进族际互信的整合性社会资源。审视我国的民族互嵌式社区,之所以能广泛实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互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嵌,一个基本的前提在于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民族平等原则的政策实践。正是得益于这一宏观政策背景,社区这一微观社会结构层面的互嵌才能实现,也才有可能在族际互信的基础上,持续正向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政策话语与实践策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丰富拓展了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路径与思路,也为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中国式新视角和新方法。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包括:共享政治权利且追求各民族真实社会平等,兼顾民族与区域因素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及其深层次理

解,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正向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中国方案,对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观念塑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方案的世界意义也由此彰显。

## 五、结论与讨论

在多民族国家成为普遍现实的今天,明确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一体两面、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十分必要。国家民族以民族国家为依托,没有民族国家,就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同样,国内各民族成员如果未曾经由国家民族观念塑造而形成一种派生的国家民族,多民族国家就无法有效地发挥其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功能。由此,让生活在多民族国家政治边界之内的各个民族从“外观”意义上的政治国民,嬗变为具有身份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内核”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就显得十分必要。毋庸置疑,当今世界局势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并不断走向复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面临退潮,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再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持续升级并引发长期战争,大国博弈的前景并不明朗;全球范围内的双边合作、多边合作面临重重阻碍;等等。受到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本国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民族结构等内在禀赋的制约,可以预见,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在塑造国家民族观念、打造统一国民身份认同方面面临的压力短期内不会消退,这也使得塑造“内核”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呈现长期性、复杂性与紧迫性。

与此同时,从社会个体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通过国家民族观念塑造而让社会个体对于自己的国民身份保持认同显得尤为重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指出的问题今天依然适用:“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国民身份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sup>[45]</sup>身份是一个“可塑概念”<sup>[46]</sup>,出现前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化叙事所造成的个体身份“纵向迁移”和“横向离散”<sup>[47]</sup>。每个人怎样理解自己的群体归属,会导致“我们是谁”有多种不

同答案。当今世界的多民族国家面临两难选择:过度强调国家认同,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认同,容易走向同化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大民族主义;而过度强调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并因此忽视、贬低乃至超越国家认同,则会造成各种地方民族主义的泛起、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等<sup>[48]</sup>。怎样运用包容性思维,通过制定并实施合乎多民族国家国情的民族政策来推进国民身份认同,塑造和谐统一的国家民族观念,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需要持续关注 and 认真解决的问题。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看,中华民族的内生性、实体性与多

元一体的结构属性使其超越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制约而延绵至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姿态发挥价值引领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强化国家民族观念的政策话语与实践策略,这一中国式的国家民族观念塑造方案既为世界提供了有别于同质性的国家民族或是“想象的共同体”式的国家民族观念塑造的第三种选择,也为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0(3):79-98+206.
- [2] 于春洋,周佳薇.多民族国家塑造国家民族观念的政策实践:基于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的国别比较[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4):21-30.
- [3]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 [4] 邹诗鹏.从国家民族及其认同建构看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1):25-34.
- [5]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 [6] 宋清员,王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和合”思想的内在理路[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23(4):76-83.
- [7] 袁文华.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理[J].广西民族研究,2019(4):9-17.
- [8] 彭新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溯源与当代建构[J].政治学研究,2022(4):133-143+160.
- [9] 青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性基础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5):27-34.
- [10] 夏引业.“国族”概念辨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1):31-38.
- [11] 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J].民族研究,2014(2):61-73+124-125.
- [12]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M]//秦孝仪.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九.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216.
- [13]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M]//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7.
- [1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0.
- [16] 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8(3):46-50.
- [17] 高承海,谭欣.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看我国“多元一体”思想的优势[J].民族教育研究,2022,33(1):110-116.
- [18] 于春洋,陈奥博.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青海民族研究,2020,31(4):8-14.
- [19] 青觉,赵超.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的构建历程及其逻辑:以《人民日报》文本为中心的考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1):68-75.
- [20] 肖锐,朱倩,黎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4):53-58.
- [2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N].人民日报,

2019-10-24(1).

- [22] 丁龙召,李丽萍.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1):33-42+182.
- [23] 严庆,谭野.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联盟论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4):39-48.
- [24]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30(1).
- [25] 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20-09-27(1).
- [26]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27] 李乐,杨显东.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纲”[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5):54-63+183.
- [28] 陈贇.多元一体:古典思想视域下中华民族的立身基础[J].探索与争鸣,2023(4):163-176+180.
- [29] 周竞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的理论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4):1-7.
- [30] IDIKE A, UKEJE I O, IWUALA H O, et al. The practice of inclusive representation in Nigeria bureaucracy: the federal character principle experience[J]. Cogent social sciences, 2019, 5(1):1-21.
- [31] 陈玉瑶.增进“国家民族”认同:法国的经验与启示[J].广西民族研究,2022(2):141-147.
- [32] 刘同舫.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8(3):4-14+203.
- [33] 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重要演讲 强调携手开创全方位合作新局面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EB/OL].(2015-11-07)[2023-12-07].[https://www.gov.cn/xinwen/2015-11/07/content\\_296237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5-11/07/content_2962379.htm).
- [34] 曾卓,熊理然,蒋梅英.印度暴力袭击事件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制[J].热带地理,2019,39(6):869-879.
- [35] 哈正利,杜鹏.菲律宾民族问题解析[J].青海民族研究,2019,30(4):27-31.
- [3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37]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2版.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296.
- [38] 叶江.浅析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之警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视角[J].学术界,2018(1):67-75+284.
- [39] 青觉.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民族政治文化解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4):18-22+26-28+5.
- [40] 林绮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历史剖析[J].世界民族,2022(6):68-78.
- [41] 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0(12):24-30.
- [42] 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J].学术界,2016(4):33-44+324.
- [43] 郑祥福,吴文炳.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左翼运动的困境与出路[J].国外社会科学,2022(3):155-165+200.
- [44] 张哲.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以科恩双重民族主义为路径的分析[J].民族研究,2023(2):12-28+138.
- [45] 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1-12.
- [46] CARUSO A, SPATH J. “Identity contain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y and Germany: an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2020,25(4):361-371.
- [47] 于春洋,于亚旭.从双分联动到多态重叠:个体身份研究范式转向[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0(1):64-71.
- [48] 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2010(2):26-35+108.

# The Chinese Plan of Shaping the National Concept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YU Chun-yang, ZHOU Jia-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 **Abstract** ]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topic faced by contemporary multi-ethnic countries, which is the practical process and result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belonging and identity of the members of all ethnic groups. The Chinese n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homogeneity of western European nation,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nations in the Americas,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 as an “imaginative community”. It is a nation with a civilization history of over 5,000 years, both endogenous and substantive, and enjoys an internal structure of diversification in unity. Fostering the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shaping schem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cept. The solution is important innovation of CPC in correctly solving the national probl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content consists of four aspects: constructing a cognitive framework, laying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ccumulating momentum and establishing emotional consensus. Consolidat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providing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ak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to enjoy necessary support from both the material and the system dimensions. The Chinese wisdom contained in the “4 + 2” scheme, i.e., sharing political rights and pursuing the truth and equal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taking into account ethnic and regional factor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respect for an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diversity, building ethnic mutually embedded communities so as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haping of the national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multi-ethnic countries. Therefore, its world significance is highlighted.

[ **Key words** ] nation; concept shaping;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ulti-ethnic countries; Chinese plan

[ 责任编辑 徐姗姗 ]